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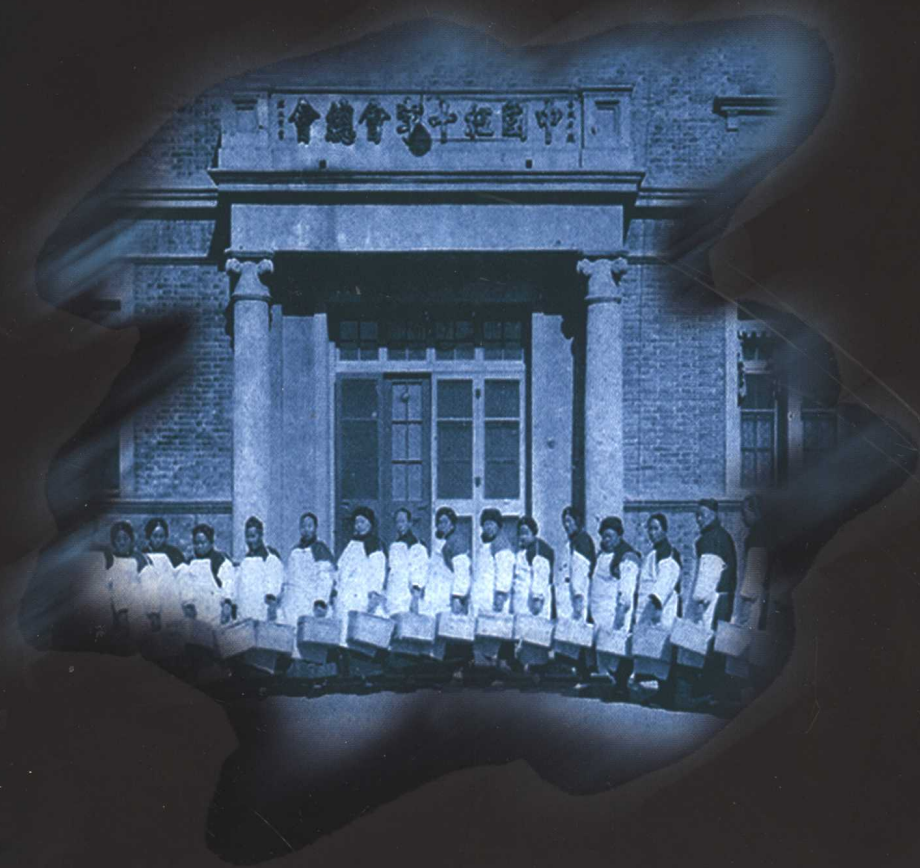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路甬祥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A SOCIAL HISTORY OF DISEASES IN MODERN CHINA

(1912—1937)

张大庆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路甬祥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A SOCIAL HISTORY OF DISEASES IN MODERN CHINA

(1912—1937)

张大庆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1912—1937) / 张大庆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 路甬祥主编)
ISBN 7-5328-5389-6

I. 中... II. 张... III. 疾病-医学史-中国-
1912—1937 IV.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10679 号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

张大庆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16.5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5389-6
定 价: 2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组织机构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 华觉明 许良英 杜石然 吴文俊 何丙郁 张秉伦 陈美东
周光召 金铎 柯俊 郭书春 席泽宗 曹效业 路甬祥 潘吉星

首席科学家: 张柏春 王扬宗

专家组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扬宗 刘钝 张柏春 曹幸穗 董光壁 廖育群 樊洪业

办公室主任: 张黎 **副主任**: 张九辰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组织机构

丛书主编: 路甬祥

丛书副主编: 张柏春 王扬宗 董光壁 王渝生

丛书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扬宗 王克迪 王政芳 王渝生 艾素珍 田森 孙永大 曲安京
刘钝 刘益东 刘佩华 刘戟锋 江晓原 关增建 李成智 李劲松
李兆华 杨舰 邹大海 邹健 宋正海 张九辰 张大庆 张志辉
张治中 张柏春 张剑 张黎 罗桂环 周嘉华 胡化凯 胡宗刚
胡维佳 赵猛 夏玉棉 姜振寰 姚远 袁向东 黄晔 曹幸穗
梁波 韩义华 韩健平 董光壁 鲁大龙 解源 廖克 廖育群
樊洪业 潘亚男

丛书常务编委会

主任: 张柏春 王扬宗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扬宗 王渝生 艾素珍 孙永大 刘钝 张柏春 张黎 曹幸穗
董光壁 鲁大龙 廖克 廖育群 樊洪业

总 序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是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的成果，是百余位科技史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这也是中国科技界第一次有规模地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意义。立题时确定的目标是：系统地收集、抢救和整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实资料，建立完整的数据库，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研究积累基本资料；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对一些重要史实展开专题研究，力求取得新的认知和新的突破；科学地总结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历史镜鉴；通过研究工作培养一批中青年科技史人才。

值得高兴的是，经过三年的努力，这些目标大都实现了。这套丛书是作者们奉献给读者的一份丰厚礼物，也将成为研究我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宝贵资料。科技创新永无止境，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永无止境。我衷心希望读者和科技史界同仁能不吝批评，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将我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推向前进，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 **浩雨祥**

2003年6月5日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科学技术自 19 世纪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曲折过程。从 19 世纪中叶自强运动中开始的“师夷之长技”,到 20 世纪初年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从 50 年代的“向科学进军”,到 20 世纪末叶的“科教兴国”战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多少希望、梦想和憧憬! 150 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全人类共同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大厦中,中国的贡献还很有限,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科学技术,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 面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深入了解和借鉴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的特性及其发展机制,总结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时候,却很少系统地探讨和总结我国一二百年来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缺乏应有的认识。结果,我们不仅不易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而可能重复旧的失当的政策和举措。因此,在面临重任和挑战的今天,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不但是学术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大约 15 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计划开展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董光壁先生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和吴熙敬先生主编《中国近现代技术史》两部大型著作,分别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印行问世。在完成上述著作不久,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又提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大型研究计划,几经周折,终于在 2000 年列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是一个跨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重要研究项目,主要包括专题研究、资料集与工具书、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资料库这三大课题。经征求各方面意见,我们选定了 30 多个二级课题,于 2000 年 11 月正式启动了这项研究。国内近 30 个科

研究所、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的百余位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和研究生承担了研究项目的二级课题。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专题研究还有待开展,尚不具备编纂系统性史书的条件,加之项目的实施期限仅为三年,因此,我们预定的研究任务是以有创意的专题研究和重要的资料建设为主,以期为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我们希望本项目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中的基本问题,拓展研究方向,推动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个案研究和学科史专题研究为主,力求在探索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史实和脉络等方面取得进展;收集、抢救和整理重要的历史资料,编辑史料选辑,建立资料中心,为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积累基本资料;总结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推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历史启发。在梳理史实的同时,也致力于探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尝试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

在短短的三年里,各课题组克服了很多困难,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方面花了大量精力,并积极配合项目的组织工作。经过努力,绝大多数课题组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研究任务,其主要研究成果就是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项目的研究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实施,是在中国科学院基础局、综合计划局、政策局和院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一部分课题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人员承担了项目的约一半的课题,研究所领导全力支持项目组的工作,为完成研究工作提供了人力保证和相应的经费。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廖克、前副所长王渝生和有关人员为项目的立项和前期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山东教育出版社将丛书列为重点图书出版计划,并为研究工作提供了部分配套经费,在专著的出版编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大连化工研究院制碱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国家测绘局、国家地震局地质

研究所、中国电力信息中心、庐山植物园、辽宁省图书馆等近 30 个单位为课题承担人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甚至提供配套经费。

在资料收集和建设方面,项目和各课题组得到了相关图书馆、档案馆和有关机构的理解和配合。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为查阅和利用档案资料提供了很多方便和帮助。还有许多单位的档案或资料管理机构向本项目二级课题提供了很多资料和帮助,具体情况详见丛书各卷的致谢或后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为项目的资料建设做了许多工作。《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学术期刊出版了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

项目顾问就项目的设立和实施提出了指导意见。项目专家组在学术指导和课题评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丛书编委会、常务编委会和审稿专家审阅各课题书稿,为提高书稿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各项日常工作,组织学术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我们谨向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合作单位以及顾问、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表示诚挚谢意!向项目各课题负责人和参与人员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撰这样规模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不少著作还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其中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恳请同人和广大读者赐教,以共同促进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开展。

张柏春 王扬宗
2003年10月31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疾病社会史研究概述	(1)
第二节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3)
第三节 课题概况	(16)
第一章 疾病谱:构成与特性	(18)
第一节 主要疾病及流行概况	(18)
第二节 疾病的构成及其特性	(36)
第三节 影响疾病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	(42)
第二章 中国近代疾病观念的变迁	(47)
第一节 近代医学模式与疾病观	(47)
第二节 近代西方疾病观念的引进	(55)
第三节 近代医学观的社会影响	(69)
第三章 传染病防治:医学建制化的开端	(78)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医学建制及其缺陷	(78)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在新型卫生保健制度建立中的作用	(81)
第三节 卫生防疫的法制化进程	(85)
第四节 卫生防疫的职业化	(92)
第五节 新卫生保健体制下传染病防治的成效	(96)
第四章 疾病控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构	(104)
第一节 卫生行政体系的创立	(104)
第二节 卫生服务体系	(113)
第三节 医疗保健制度	(119)
第五章 理解疾病:卫生知识的大众化	(125)
第一节 卫生宣传与疾病预防	(125)

第二节	卫生知识的普及;传媒的作用	(135)
第三节	卫生运动	(145)
第六章	社会卫生:城市与乡村的实践	(150)
第一节	以医院为中心的社会服务——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152)
第二节	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	(157)
第三节	妇幼卫生工作的初创	(165)
第四节	乡村医疗卫生的改进试验	(174)
第七章	疾病模式转变中的医患关系	(188)
第一节	医患关系转变的动因	(189)
第二节	民国时期医事纠纷概况	(194)
第三节	医事纠纷的案例分析	(201)
第四节	影响医事纠纷转归的因素	(210)
第五节	医学职业团体与医学伦理准则	(217)
结语	(222)
参考文献	(230)
人名索引	(242)
主题索引	(246)
致谢	(254)

导 论

疾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多维度的。疾病既可被认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学事件,导致个体的躯体损伤和疼痛,也可被视为复合的心身事件,给病人添加躯体和精神上的痛楚,还可作为复杂的社会性事件,小到影响家族的繁衍,大至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研究不甚关心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医学史中的疾病史研究也只是关注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的进步,而忽略了疾病的社会文化价值。20世纪中期以后,有少数医史学家开始转向医学社会史、疾病文化史研究,强调医学史与疾病史研究中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年鉴学派等新编史学理论的影响下,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为西方医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涉足疾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目前,疾病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医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尚比较薄弱,因此开展疾病的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节 疾病社会史研究概述

一、疾病史与疾病社会史

1. 疾病史的研究传统

疾病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诊断治疗技术欠发达的古代社会,从前人的经验和历史的记录中学习医学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医生们为探讨疾病的原因、寻找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研究疾病的历史。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的《论古代疾病》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历史研究文献,汉代医生淳于意的《诊籍》则是我国早期疾病史研究的

重要史籍。然而,这些实用意义上的疾病史研究关注的是疾病本身的自然史过程或对疾病自然史的干预过程,与现代化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属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学术意义上的疾病史研究始于19世纪下半叶。1864年,德国医学家和医史学家赫尔希(A. Hirsch, 1817—1894)出版了两卷本的《地理和历史病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historisch - geographischen Pathologie*)。作者按时间和地域详细地论述了各种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学分布。1886年,该书被译成英文,成为疾病史研究的经典之作。20世纪以来,疾病史研究日趋繁荣,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著作,如秦瑟(H. Zinsser)的《耗子、虱子与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 1935)、卡特莱特(F. Cartwright)的《疾病与历史》(*Disease and History*, 1972)以及麦基翁(T. McKeown)的《人类疾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Human Disease*, 1988)等。当代西方疾病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基普勒(K. Kiple)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该书考察了东西方的医学源流中不同的疾病观念、现代医学发展下疾病观念的变化、世界不同地区疾病的分布和主要特点以及疾病地理学,详细论述了从天花、鼠疫到埃博拉病、艾滋病等158种人类的主要疾病,以及有关这些疾病发生、认识的历史。^①

现代疾病史也显现出更丰富的研究取向:除疾病自然史之外,疾病观念史、疾病社会史以及疾病文化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疾病自然史是历来医学家和医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涉及到疾病的原因、进程及其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如阿克莱特(E. Ackerknecht)的《最重要疾病的历史与地理学》(*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eases*, 1965)和伯内特(M. Burnet)的《感染性疾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Infectious Disease*, 1962)等。

疾病观念史主要探讨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对疾病认识的演化历程。特姆金(O. Temkin)的《癫痫》(*The Falling Sickness*)不仅讨论了癫痫病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断治疗的历史,而且梳理了有关癫痫病观念的演变,通过癫痫去解释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科勒曼(W. Coleman)在《北方的黄热病》(*Yellow Fever in the North*)中,通

^① Kiple K.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过研究 19 世纪的三次黄热病流行,探讨了当时关于传染与非传染的概念、流行病思想的变化以及这些概念是如何用于解释疾病的。梅杰(R. Major)的《疾病的经典描述》(*Classic Descriptions of Disease*)考察了从古希腊到 20 世纪人类对传染病、代谢病、铅中毒、循环系统病、血液病、肾脏病、呼吸系统病、营养缺乏病、变态反应病和消化系统病等十类近百种疾病的认识过程。^①温斯洛(C. Winslow)的《征服流行病:观念史的一章》(*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论述了人类对流行病的认识,从神灵世界、上帝的惩罚、自然哲学的疾病观,到传染概念的萌生、对瘟疫认识的深入以及细菌理论的建立的演化史。^②卡普兰(A. Caplan)等在《健康与疾病的概念》(*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中通过比较西登汉姆(T. Sydenham, 1624—1689)《医学观察》的前言、莫尔干尼(G. Morgagni, 1682—1771)《疾病的原因与位置》的序言、比沙(X. Bishat, 1772—1802)《病理解剖学》的绪论、伯尔纳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微尔啸(R. Virchow, 1821—1902)《细胞病理学》中的主要论断以及坎农在《躯体的智慧》中关于生物学和社会稳态的思想,考察了疾病概念的历史演变。^③此外,还有从考古学的角度对疾病史进行研究^④,疾病的地区史和国别史研究等^⑤。

相比起疾病自然史和疾病观念史,疾病社会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H. Sigerist, 1891—1957)、罗森(G. Rosen)等人呼吁关注疾病的社会史研究,但反响不大。60 年代以后,以罗森伯格(C. Rosenberg)《霍乱年代》(*The Cholera Years*)的出版为标志,疾病社会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详见下文)。

我国近代的疾病史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初。由于当时危害严重的疾病主要是传染病、寄生虫病,因此传染病、寄生虫病的历史研究在早期的疾病史研究中占有相当比重(见下表)。例如,陈援庵在《医学卫生报》上发表的《肺癆病传染之古说》(1909)、李祥麟在《中西医学报》上发表的《鼠疫之历

① Major R. *Classic Descriptions of Disease*.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 1945.

② Winslow C. *The Conquest of Epidemic Disease: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③ Caplan A, Engelhardt H, McCartney J, ed. *Concept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ddison -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143—208.

④ Charlotte Roberts, Keith Manchester.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⑤ Gerald N Grob. *The Deadly Truth: A History of Disease in America*.

史》(1910)、黄胜白在《同德医学》上发表的《霍乱的历史》(1921)、伯力士在《东北防疫处报告》中撰写的《主要传染病流行于中国的历史》(1931)、李涛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我国疟疾考》(1932)、宋大仁在《医史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人体寄生虫病史》(1948)等。皮肤性病史(其中主要为性传染病与麻风病)和营养缺乏病史的研究也占一定的比例,而其他疾病史的研究只是零星点缀,此外,还有余岩等关于病名史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前疾病史研究概况^①

	传染病	寄生虫病	营养缺乏病	皮肤性病	外科病	妇科病	其他疾病
论文	77	16	10	27	7	8	20
%	46.7	9.7	6.1	16.4	4.2	4.8	12.1

近代有关疾病史的论著,最早可以追溯到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1919),该书设有疾病史专篇,分为传染病史、呼吸器病史、消化器病史、心脏肾脏新陈代谢病史、泌尿器病史和神经系病史等六章,简要地讨论了35种疾病的名称、诊断以及治疗的历史演变,其中传染病为18种,占内容的一半以上。王吉民、伍连德的《中国医史》(1932)虽然没有专门的疾病史章节,但对近代流行的主要疾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等均有较详实的记载,伍氏作为我国近代医学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曾领导过鼠疫防治、海港检疫等工作,书中保存了许多重要史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疾病史研究颇为活跃,研究的疾病依然以传染病、寄生虫病为重点,内容则以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为核心。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是政治重于学术。80年代以后,疾病史研究显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尤其是部分学者开始从疾病认识与治疗史、病名考证扩展到疾病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② 此期出版的两部疾病史著作——陈胜昆的《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和范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被认为是“最值得瞩目的”。^③ 靳士英在《疾病史研究60年》中回顾了疾病史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并指出从《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上看,疾病史在医学史研究中所占

^① 根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所编《医学史论文资料索引》(1903—1978)收录的论文统计。

^② 如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张大庆的《艾滋病:从疾病史到社会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7(1):28—35)。

^③ 参见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5—26)。

比例不足 10%，但在其他论文和专著中包含的疾病史研究并不罕见。^① 1994 年，中华医史学会在重庆召开了主题为疾病史的学术会议，对促进国内的疾病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除大陆外，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疾病史研究也值得关注。港台地区的“生命医疗史”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医学史研究，不过从事研究的学者基本来自历史学界，因此他们更多地从疾病的社会文化维度切入。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设立了“生命医疗史”小组，2000 年 6 月在台北举行了“疾病的历史”学术讨论会，对推动海峡两岸的疾病史研究有积极的影响。但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医史学界的疾病史研究基本上仍集中于传统的疾病史研究领域，如对古代疾病病名的考证，疾病的流行病学史，诊断、治疗与预防成就的评述等，仅有少数论文涉及到疾病社会史、文化史。^②

国外学者对中国疾病史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耶鲁大学医学史与科学史系的司马斯(W. Summers)在《1830—1911 年间中西医学的一致性：天花、鼠疫和霍乱》中，比较了中西方对待几种传染病——霍乱、天花和鼠疫的防治的观点，指出在抗生素和体液疗法发明之前，中西方对传染病的治疗上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甚者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一致之处。^③

2. 疾病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医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有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在医学史理论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创新，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不仅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人们全方位、多维度地审视医学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史被一种简单的实证主义统治着。伟大的医生、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诊断治疗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医学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主旋律，因此被称为医学的“辉格”史(Whiggish history)。有学者认为这种医学史是“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④ 的确，早期的医学史和疾病史通常由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所写。

① 新士英. 疾病史研究 60 年. 中华医史杂志, 1996, 26(3): 152—161.

② 从 1988 至 2002 年《中华医史杂志》所刊登的有关疾病史的 53 篇论文中，仅有 2 篇探讨疾病与社会文化史的内容。

③ Summers W. Congru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rom 1830 - 1911: Smallpox, Plague and Cholera. Yale Journal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1994, 67: 23—32.

④ Porter R, et al.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Croom Helm, 1987. 1.

从古代至 20 世纪初,在医疗手段局限的情境下,医生们通过疾病史的研究来了解疾病流行的特点以及先辈的经验,从中获得启迪。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疾病史研究对医生们理解疾病机制、提高诊断治疗水平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疾病史研究的临床实用价值逐渐降低。

在另一方面,医史学家对医学史和疾病史的问题和前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罗森提出医学史应该从简单的人物评价和史实叙述转向更广泛地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他指出:“视角的改变常常揭示出事物的新的一面,医学史就是如此。通过以医学的社会特征作为出发点,医学史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成为了人类社会为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所付出的各种努力的历史。”^① 美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是最早关注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强调需要从更广泛的观点解释医学的过去,致力于“用一般文化作画布,在那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②。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人与医学》一书中,他不仅讲述了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观念的变化和诊断、治疗技术的发展,而且强调了疾病观念的社会文化影响和社会对病人态度的变迁。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卫生史的里程碑》的前言中,他写道:“有人说我对人类环境描述太多,但我们已经明了个体遗传和社会环境对疾病都有着重要影响。还有人认为我从病人而不是医生的角度探寻医学史,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赞美,因为病人或者健康的人是所有医生活动的目标。”^③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编史学理论对医学史与疾病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克拉克(E. Clarke)呼吁医学史应从传记和叙述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开展医学社会史、制度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的编史学纲领强调医学史研究应将健康、疾病和医学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联系起来。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关于“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上被认为是进步的医疗干预的增加可能潜在着消极因素,他关于知识社会学的论述指出了医学科学也广泛地接受了社会—政治的价值。英国医史学家波特(R. Porter)十分重视从病人的角度研究医学史。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医学社会史凸显出来。医学社会史将

① Rosen G. People, Disease and Emotion: Some Newer Problems for Research in Medical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67, 4: 5—23.

② Sigerist H. 人与医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

③ Sigerist H.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Hygien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7。

医生、病人以及社会经济等均纳入其研究视野,更多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及其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广泛关系是形成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基础。

医学社会史是从过去以研究“伟大的医生”为主导的传统向研究医学活动中的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的转变,是从记录医学的胜利向探讨医学中尚存在的问题的转变,是从考察疾病认识的历史进程向探讨疾病复杂的社会影响的转变。现代医学史的研究不仅关注医学理论和技术方面,而且更多地注意到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理解,病人对医学的信赖程度以及对医生的态度,卫生保健制度及公共卫生等方面。医学史研究的问题也显示出多维性,如疾病史研究不仅探讨疾病理论、防治的历史,也注意到疾病所引起的个人和公众的反应,妇女在卫生职业中的历史以及妇女卫生保健性质的变化,科学在医学职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医学政策、制度的历史,疾病史与人类学的关系等也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与此同时,国际卫生史问题也日益引起医史学家的重视,如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医学发展的影响、传染病对世界各国及其对国际卫生政策的影响、国际卫生组织的作用等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出现。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不同文化传统关于健康、疾病观念的差异受到了医史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更加清楚地显示了健康与疾病不仅只是生物学现象,而且更多的是社会和文化现象。

疾病史研究一直是医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如前所述,目前的疾病史研究已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范围,疾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医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疾病的细菌理论建立之前,从临床、流行病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方面对疾病史进行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前细菌理论时期的医史著作旨在考察疾病的原因,以便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帮助。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疾病的原因和防治已不再迫切需要医学史提出佐证,于是疾病史的研究转向叙述和分析疾病对人类情感的影响等超越生物学的事件,转向更加广阔的人类疾病的社会结构。通过观察、分析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部分的疾病——病人,可以拓宽人类研究疾病原因、变化及其影响的基础。在西方,已有许多历史学家从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观点来研究疾病史,试图勾勒出一幅人类对疾病反应的全景图。如罗森伯格研究19世纪霍乱流行的《霍乱年代》(*The Cholera Years*),布兰德(A. Brandt)关于梅毒史的著作《没有魔